

新定位、新范式、新样态:大历史观视域下的国家治理

郭苗苗 张岩

(沈阳化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沈阳 110142)

摘要: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深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成就取得的经验,需要大历史观视野: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国家治理探索经验中创新国家治理定位,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经验中开创国家治理新范式,从新时代国家治理探索经验中塑造国家治理新样态。在此基础上,可以更加深刻地领悟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进程取向,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人类社会治理作出更大的贡献。

关键词: 大历史观; 国家治理; 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经验

中图分类号: D6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6916(2025)07-0030-04

DOI:10.16721/j.cnki.cn61-1487/c.2025.07.023

New Orientation , New Paradigm , New Pattern: Nation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cro-History

Guo Miaomiao Zhang Yan

(Marxism School , Shenya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 Shenyang 110142)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s a key element in the promo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order to deeply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gained from the achievements in national governance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macro-history view is needed: to innovate the orient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from the experience of exploring national governance in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 to create a new paradigm of national governance from the experience of exploring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 and to shape a new patter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from the experience of exploring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On this basis , it is possible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en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and to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the realiza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the advancement of human social governance.

Keywords: macro-history;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national governance experience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我国传统治国理政的思想土壤,依据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蓝图,把握国家治理新定位、开创新范式、构建新样态,积累了宝贵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经验,走出了一条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历史,是为了启迪今天、昭示明天”^[1],概言之,大历史观就是我们要将历史事件置于较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从古今中外多重维度揭示事物变化,以更为宏阔的历史视野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因此,在这一视域下,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各个时期的国家治理经验,以确立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的新定位、新范式、新样态是极其必要的。

一、以中国古代社会国家治理的经验为鉴,创新国家治理新定位

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这些经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所要挖掘的本土资源和独特优势。中国共产党作为治国理政的主体,借鉴应用了这些经验,立足国家治理的现代性、人民性和服务性的全新定位,创造性地发展了国家治理。

(一) 立足现代性的社会条件的定位,创造性地发展国家治理

中国古代社会有其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是阶层较为单一的家国同构社会,中央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官僚政治,男耕女织占据主导地位的小

农经济,深受统治阶级长期推崇的儒家主流思想的影响。这些社会历史条件构成了中国传统国家治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内在的规定了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本质和边界。所以,我们要分析、抽离其治理理念、原则、方式、方法等合理部分,立足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性的全新定位,创造性地发展国家治理。也就是说,要把握国家治理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现代性特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经济上,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相结合的方式调控国民经济运行;在政治上,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民主政治;在文化上,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转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基于对这一全新定位的把握,中国共产党成功借鉴我国古代社会国家治理经验并融入现代化体系。例如,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的目标是小康,即一种社会和谐、生活安定,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低水平社会。中国共产党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小康”思想,大同思想“成为中国人民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文化基因”^[2]。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发展了“小康”这一思想理念。党的十八大提出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发展目标,党的十九大明确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2021年我们庄严宣告小康社会的建成。这都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将传统治国理政经验中的“小康”注入了现代性的内容,创造性地发展了国家治理。

(二)立足人民性的社会利益代表主体的定位,创造性地发展国家治理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受到专业教育的是少数知识精英,即古代的士族群体。士人主要承担着文化传承、文化传播、学术研究、教育等职能,与后世的知识分子有些类似^[3]。他们通过科举等途径获得权力,这就使得知识精英和权力联合参与国家治理,虽然提出了“为政以德”“民贵君轻”的思想,但不过是认识到自己有抚育民众的责任,民众只是一个被关照的存在。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利益代表的主体定位就是精英阶层。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汲取人民本位的国家治理经验,突破古代精英治理的局限,最大程度地发挥人民民主。例如,在知识分子的定位上,知识分子不再是象征权力的精英阶层,而是主要从事脑力活动的劳动者。那些拥有公共权力参与社会管理的人,凭借自己的能力被选拔出来,履行的是人民

所赋予的权力,而不是随意、任性的私人权力。在国家治理上,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人民拥有同政府协商事务,合作进行国家治理的权力,且参与国家治理的渠道更为广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和社会的重要路径。”^[4]这都说明我们目前的国家治理是依托人民这一全新社会利益代表主体的治理形式。

(三)立足服务性的社会治理价值取向的定位,创造性地发展国家治理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封建君主、臣子、宗亲所构成的阶级,利用权力维护其利益和统治。普通民众没有政治权力,只能从事社会的基本生产。这就构成了管理和被管理、统治和被统治、“我命令,你服从”^[5]的基本治理逻辑。因此,中国古代社会的国家治理定位为统治取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开辟国家公共权力走向复归的路径,实现国家治理的“统治性”取向定位向“服务性”取向定位的转变。立足服务性取向的定位,管理和被管理的统治关系,转变成非对立的社会分工关系,突破了古代社会以治理维护统治的冲突性。民众不再是受到统治和驱使的对象,而是管理者的服务对象,国家治理取得了创造性发展。例如,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本认为百姓安居乐业是国家稳定的基础,其看到了人民所具有的巨大力量。故此,推行了如均田或限田、使民务农、轻徭薄赋、轻缓刑罚的政策,但究其缘由是出于对人民力量的忌惮,故而在重民的同时加强了对人民的限制和防范。当代中国的以民为本则是以人民为中心,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例如,我们做好“三农”工作,以服务性的取向定位强调重农主张,近些年先后实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

二、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经验为鉴,开创国家治理新范式

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党领导下“以国家安全为基础”的主权政治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政治的有机融合^[6]。因此,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现的是不同权力运作的有机融合和优化重组,这正是我们不同于西方国家治理现代化所在,也是对“社会主义国家何以善治”命题的回应。无论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策略,还是改革开放后从管制思维到治理思维的转向,我们一直都是在善治路径的探索中开

创国家治理新范式,彰显“中国之治”的独到智慧。

(一) 群众路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交相互动的治理新范式,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开辟党、国家和社会总体利益相一致的相容共生治理新格局

新中国成立之初,《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初步显现出国家治理焦点的转变。这一时期是通过群众路线的组织化渗透,以“团结一批评—团结”的技术路径,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共同利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将市场、个体、社会、政府多方利益主体拉入现实博弈,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打破上下级分层的权力关系,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和政府主导的单一化社会治理模式被打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速了社会内部人口、知识、技术和资金在资源配置中的跨域流动和聚集效应,形成了区别于以往的流动性社会^[7]。从治理层面来看,市场的流动性为个人利益需求以及身份认同创造了更为灵活的自主空间,能够满足大众更为多样化的需求。因此,在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导下,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交相互动,人民群众共享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成果,既满足了大众需求又兼顾了个性需求,形成了兼顾规范和差异的全新治理态势,开创了“中国之治”的全新范式,开辟出党、国家和社会总体利益一致的共生治理新格局。

(二) 国家和社会权力关系耦合形态的治理新范式,摆脱了西方二分对峙治理模式的困境,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善治的道路

在历史传承和改革开放的推进中,立足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基础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在保持制度权威框架的规范性和多层面、多向路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上,国家与社会间的权力关系转化展现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独特的耦合形态。这种耦合形态,是党的领导下兼具国家制度凸显、民主程序与治理机制融合的丰盈社会机体形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人为本的治理取向,构建“一核多元”的治理框架,最大限度实现共商共治的治理新范式。在这样的范式中,国家安全、权威规范和社会及个人自由之间形成适时转化和相容共存的灵活机制。而西方的治理,总是将社会的民主从国家专政和制度规范中剥离出来,

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其间的对立,或者削减国家和制度规范的优势,或者过度强调个性化和多样化。在西方的国家治理中,国家权威框架规范和社会主体活力此消彼长相互消解,精英阶层的全面压制和大众被迫的愚昧,二分对峙的问题尤为凸显。中国之治下的国家和社会耦合形态的新范式破解了这一难题,为人类在善治路径的探索中,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三) 管制思维向治理思维转型的国家治理新范式,破除新自由主义治理乱象,指明全球治理秩序发展的新方向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始终在民主政治范畴内,将“人民至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贯彻到治理全过程,有机融合党的领导、政治协商、市场竞争机制、国家干预等诸多要素,从彰显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广阔视野之下,为全球治理新秩序指明进路。从思维转换层面来看,我们实现了从国家理性干预为主导的管制思维到多元主体广泛参与、民主化效能深度保障的治理思维转型,实现了民主和法治的辩证统一。反观西方所面临的治理困境,他们的国家治理目前受到共同体规范同个体欲望的冲突、制度构建的权威和个体质疑、社会财富流动不均等结构性矛盾的掣肘。究其缘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无疑是始作俑者,该思潮所主张的“保卫社会”和“解放流动性”的民主化治理以及“去组织化、去监管、反压抑”的治理路径和“弥散”的民主话语,使得国家和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失衡,甚至严重消解了国家存在的合理性,出现了民粹化的街头暴力乃至法西斯式的极端政治。故而,我们要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独特权力结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保障人民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同心同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可见,治理思维的国家治理新范式,使得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相得益彰,既能兼顾党性与人民性的内在统一,也能防范国家与社会、精英与大众相分离的治理风险发生;打破技术策略的应用与满足人民主体的精神体验、价值归属的管制壁垒,旨在消解工具机制、资源配置与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和“满足感”之间的隔阂。

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治理的探索经验为鉴,塑造国家治理新样态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将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目标任务之一。现代化社会治理的生动实践回答了“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时代课题,建构出一点多面,凸显中国之治、科学民主互促、数字智慧融合的治理新样态。

(一)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发挥党的关键枢纽作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建构“一点多面”的治理新样态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强治国理政能力建设并从政治自觉的高度不断进行自我审视,接受社会、人民的监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构建出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核心点,各项制度多层面维护民主权利的“一点多面”的治理样态。一是坚持党全面领导国家治理的核心点。进入新时代,针对部分干部在党的领导上认识模糊,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行动乏力的情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及其民主政治与治理实践的最高原则,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政治能力建设放在首位,不断提高“政治三力”。同时,制定一系列改革举措,对党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团体等部门机构团体的领导制度进行完善。二是坚持完善各项保障人民民主的制度,多层面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积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制度等多项制度,从制度优化层面全面保障人民依法履行民主权利,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日益提升。

(二)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制度机制改革,建构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高效能治理新样态

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社会治理离不开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制度机制改革。首先,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沿阵地和晴雨表。高质量发展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的经济发展新模式。这一模式的形成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中探索出来的,是在化解新时代我们面临的协调失灵、功能异化等问题中形成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中能为国家的现代化治理寻找到新的着力点。同时,经济高质量发展状况体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程度,是治理效能自我监测的晴雨表。因此,我们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经

济高质量发展,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驱动下的新方向定位和新发展阵地的开拓。其次,深化制度机制改革,推进制度优势到治理能力的效能转化,为现代化治理提供新的空间。在国家治理中,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以及利益固化的现状制约着治理能力的效能提升,压缩着制度优势的转化空间。为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制度建设,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多点发力、全面突破,破除各种体制机制藩篱,取得了历史性变革,我们的制度优势正由“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转向中凸显治理效能。

(三) 着力破解新问题新挑战,把握科学技术的时代性变革,建构科学民主互促、数字智慧融合的治理新样态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新需求日益多样,社会经济参与主体日益增多,其中的博弈日益复杂。加之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的广泛应用,国家治理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革新。因此,应对新挑战新变革,构建兼顾科学与民主、紧跟时代发展的治理样态迫在眉睫。一是要兼顾科学治理和民主治理。要把握“三大规律”运用科学的方法处理社会事务,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元利益诉求;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科学谋划治理理念、制度、策略,平衡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经济发展关系,避免出现空心化、表象化、形式化的假民主。二是要与时代发展同频,以技术革命为契机,推进数字智慧治理。要将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应用在国家治理的技术策略上。目前,人工智能、云计算、云端管理等技术日臻趋于完善,可以更加智能地满足不同的国家治理场景要求,构建数字智慧融合的国家治理样态已成为可能。这深刻影响着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新格局的双向互动。通过构建数字智慧治理样态,可以凭借新的技术占据主权政治优势,拓宽主权国家治理效能实现的新路径,同时彰显数字智慧治理样态这种新技术对构建全球治理新秩序的意义。

四、结语

国家治理经验是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参考,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治国思想的继承发展,也是从历史视角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整体审视,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重要一环。大历史观视域下探究国家治理,(下转第46页)

时有效地提醒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进行处置,构建起整个地区的风险监测预警体系,依靠科技为基层应急管理提供智力支撑。三是建立相邻乡镇应急救援队伍共训机制,采用“理论知识+实战演练”的方式对相邻乡镇应急救援队伍进行训练,提高应急救援队伍的理论知识水平和实战能力,确保突发事件发生后就近处置,救援人员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采用正确的救援方式,为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提供坚实的保障。

三、结语

通过对 X 镇的调查分析,发现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已经具备良好的治理基础,但仍有很大的提升和优化空间,需要进一步推进体系建设,提高基层应急能力。针对当前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存在的短板与不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框架”,这意味着基层应急管理体系的完善绝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需要总体统筹谋划,从风险类型多样化、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角度着手,构建“集中统一、上下联动、反应灵敏”的应急管理体系,从而实现从风险治理“碎片化”到“全灾种、大应急、全过程”的风险治理模式转型。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上接第 33 页)是坚持立足实际、守正创新对国家治理新定位的把握,也是坚持协调各方、统筹兼顾对治理范式的开拓创新,更是坚持党的领导、紧握时代变化对治理样态的深入开拓。在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探索必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不懈奋斗中,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人类社会治理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406.
- [2]徐大同.中国人民拒绝自由主义,接受共产主义的文化基因[J].政治学研究,2012(3):14-19.
- [3]葛荃.权力宰制理性:土人、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社会[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3.
- [4]包心鉴.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新创造新发展[J].学习与

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4).

- [2]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意见[EB/OL].(2024-10-08).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10/content_6978739.htm.
- [3]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EB/OL].(2024-07-21).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htm.
- [4]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的通知[EB/OL].(2022-02-14).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2/14/content_5673424.htm.
- [5]石发勇,辛方坤,等.风险社会治理与国家安全:以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为背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57-58.
- [6]董若愚,于涣茹,伍万云.地方政府与基层组织应急管理联动机制研究:基于安徽省皖南地区部分相邻地区乡镇的调查[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6(3):10-13,24.
- [7]薛澜,王哲.基层应急管理中的组织协调:问题根源与解决思路[J].行政论坛,2024(4):91-100.

作者简介:黎冯梅(1995—),女,汉族,广西桂林人,中共蚌埠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为应急管理。

(责任编辑:冯小卫)

探索,2017(3):1-11,185,174.

- [5]夏周青.治道变革与基层社会矛盾化解[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4:3.
- [6]赵中源,黄昱.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变革逻辑与实践图谱[J].学术研究,2022(11):7-12.
- [7]赵中源,黄昱.经济特区:由发展转轨到治理转型的助推器[J].学术研究,2020(11):1-6.

作者简介:郭苗苗(1990—),女,汉族,内蒙古赤峰人,法学博士,沈阳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张岩(1997—),男,汉族,山东淄博人,单位为沈阳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责任编辑:王宝林)